



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

日共《赤旗报》評論員文章



人 民 出 版 社



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

日共《赤旗报》評論員文章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ケネディとアメリカ帝国主義

根据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日共《赤旗报》译出

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

日共《赤旗报》評論員文章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1 $\frac{3}{4}$ · 字数 39,000

1964 年 6 月第 1 版

196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号 3001·820 定价 (西) 0.17 元

統一書號: 3001·820

定 价: 0.17 元

目 录

一、美化肯尼迪的大合唱	(1)
二、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論調	(5)
三、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論調	(15)
四、肯尼迪“两手政策”的本质	(26)
五、美苏“緩和緊張局势”和“遏制中国”政策	(39)
六、加强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45)

一、美化肯尼迪的大合唱

最近几年形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反动势力在意识形态方面有计划地向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发动以美化美帝国主义为内容的各种各样的攻击。这种攻击在肯尼迪总统上台以后，已经变成越来越有组织而且大规模的了。特别是以一九六二年十月发生的“古巴危机”和一九六三年七月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转机，这种攻击变本加厉地进行，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肯尼迪遇刺丧命以后，委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有人说：打起“自由”和“进步”的旗帜的“年轻而勇敢的总统”，一面同“自由阵营”内部顽固的冷战派和极右派的强烈抵抗进行斗争，一面在外交路线方面，在通过改组和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的办法来保持“均势”的背景下，为了应付“古巴危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一触即发的“毁灭人类的危机”，决心勇敢地寻求美苏间的“和平共处”，终于签订了成为“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且在国内政策方面，他提出了成为美国民主最见不得人的部分的黑人问题，为废除种族歧视而勇敢地进行挑战；虽然肯尼迪在实现这一“伟大事业”的中途倒下去了，但是，他举起的“伟大理想的火炬”并未熄灭，他的继承者肯定会继承他的事业；等等。诸如此类的美化肯尼迪的言论，以及美化美帝国主义及其内外政策的言论，在最动人的美丽辞藻和变化多端的一切伴奏的掩饰下，像洪水一样地泛滥起来。不仅是日本所有的反动派，而且连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

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个“大合唱”。譬如反党修正主义者内藤周一伙的机关报《新路綫》（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一期）写道：

“肯尼迪不幸逝世的客观意义，是很清楚的。他是由于在缓和國際緊張局势和种族問題上表现了果断而遭到牺牲的。他的牺牲是对爭取和平共处的努力的一个打击。”

同样，反党集团春日庄次郎一伙发表了一篇题为《当肯尼迪遇刺逝世之际》的声明（載于《結構改革》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号）。这篇声明說：

“肯尼迪遇刺逝世的噩耗傳來，全世界感到非常震惊，全人类都立即表示沉痛的哀悼。这也是因为，肯尼迪之死对于今后以和平共处与缓和冷战为中心的形势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关系。在世界各国人民表示哀悼之意的深处，有着这样一种决心：要继承并进一步推行由肯尼迪和赫魯曉夫共同迈出了第一步的路綫，爭取朝着和平共处的道路前进。”

目前形势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和平民主力量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参加歌颂和美化肯尼迪的大合唱，并且在思想方面和实践方面开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容忽视的影响。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美化肯尼迪的做法，并没有采取单纯地一味頌揚的方式，而采取这样一些手法：一种是“善恶两面論”，就是說，在肯尼迪政策里面，除了像“遏制中国政策”那样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坏的”一面以外，还有“缓和冷战”这样一种和平共处政策的“好的”一面；一种是有条件的美化論調，就是說，肯尼迪虽然同样是帝国主义者，但必須把他同好战的反动派区别开来，他是“有胜于无的明智派”。

譬如，日本社会党机关报《社会新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八日出版的一期）說：“肯尼迪政府无疑是帝国主义政府，但他是不同于

那些加剧紧张局势准备发动毁灭性战争的反动派的‘现实派’”，同时提出了“善恶两面論”的典型看法。而該报的“新聞述評”作了結論說：“虽然肯尼迪外交政策給希望和平的人們造成的‘明暗’两面是一个整体，但是肯尼迪外交政策的特点在于，他曾經压制住国内右派的强硬分子，坚决推进了同赫魯曉夫举行私人会談的外交政策。”就像这个結論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承认肯尼迪政策中存在着真正想要爭取和平的一些“好的方面”的“善恶两面論”，实际上一定会随即变成这样一种看法：把冷战政策这种另一个“坏的方面”看成是为了說服国内的冷战派而不得不采取的“伪装”，或者把这看成是被迫从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下来的“遗产”。由于这样的解釋，最后就变成了这种观点：认为整个肯尼迪政策的根本特点，就是向和平政策轉变。这是一种同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是战争和侵略、压迫和倒行逆施的观点尖銳对立、完全相反的观点。这件事實表明，任何有条件地美化帝国主义的論調，都容易变成、而且也不能不变成美化它的本性的論調。

但是，对于我們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說来，极其严重的事实是，这种导致美化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本性的有条件的美化論調，不仅在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間存在，而且竟然在国际和平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人中間出現了。

譬如，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在去年十一月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會議上所作的报告中評論說：“肯尼迪是在‘冷战’的困难时期就任总統的。而且，由于美国政策的連續性，他不可避免地給冷战帮了忙。但是，他在任职期間，显然已經远离了那种政策。”欧洲的一位代表还提議要为肯尼迪之死默哀。一部分代表提出了下述这样一种出人意料的主張說：“和平的敌人”不是美帝国主义，而是“战争”，不应当把和平斗争的矛头指向美帝国主义。

還有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高度評價肯尼迪說，他是一位現實地估計國際形勢、努力緩和世界緊張局勢和改善美蘇關係、並且對協商解決有關冷戰的各項問題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卓越的政治家”。

然而，肯尼迪正是一個好戰成性和反動成性的美帝國主義的最高領導人。因此，美化肯尼迪政策的做法，就不可避免地不能不美化美帝國主義。而美帝國主義是“最大的國際剝削者”，“世界反動勢力的主要堡壘，國際憲兵，全世界人民的敵人”，“現代帝國主義主要的經濟、財政和軍事力量”，“侵略和戰爭的主要力量”，“現代殖民主義的主要堡壘”。（《莫斯科聲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第二國際的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贊成“保衛祖國”而站到帝國主義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白勞德宣揚同美帝國主義實行階級合作，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鐵托和卡德爾宣傳把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相提並論的“積極共處論”，為帝國主義開脫罪責。就像這些實例所顯示的那樣，怎樣評價帝國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試金石之一，是區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根本性質的分水嶺。非常明顯，一切美化美帝國主義及其領導人、迴避同美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言論，只能是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而變成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言論，這種言論只能解除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的武裝，給世界人民為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和侵略政策、壓迫和反動政策，爭取獨立、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鬥爭，造成無可補償的損失。

我們所以要在肯尼迪遇刺喪命以後，在這個贊美的大合唱中重新總結對美帝國主義的評價和它的“兩手政策”的本質，揭露企圖迴避同美帝國主義鬥爭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理論的罪惡，是

因為我們確信，捍衛《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革命原則，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一切人民運動內部干淨徹底地肅清美化美帝國主義的論調這件事情，對於全世界人民共同事業的偉大勝利來說，是絕對必須完成的緊急任務。

二、美帝國主義向兩翼分化的論調

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美化肯尼迪的論調，首先可以叫做“美帝國主義向兩翼分化的論調”的下述論調為其基礎：

(1)由於社會主義體系的发展，殖民主義的崩潰，和平民主力量的壯大等等，國際力量對比已經發生變化。另外，熱核戰爭的“毀滅性的後果”已經很清楚。由於這兩個因素的作用，美帝國主義統治階級內部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產生了重要的意見分歧。

(2)在一方面，正在形成下述這樣一個帝國主義的“明智派”：他們冷靜地估計已經發生變化的世界現實，認為無論如何也要避免世界熱核戰爭，尋求兩個體系和平共處的道路，以代替核戰爭的道路。可以認為，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是代表帝國主義者的這一翼的政治家。

(3)在另一方面，仍然存在著帝國主義最富於侵略性、最好戰和最冒險的一派，他們頑固地繼續執行很可能把世界推向熱核戰爭邊緣的危險的冷戰政策。約翰·伯奇協會、三K黨、麥卡錫主義殘余、戈德華特集團、反動的種族主義者、五角大樓的反動的軍國主義者、民主黨和共和黨內部的右派等等，就是這些極右派的代表。密謀刺殺肯尼迪的，也就是這些勢力。

(4)因此，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在保衛和平的鬥爭中的中心任務是，爭取同代表前面一翼的美國政府通過協商，進行談判，孤

立后面一翼，从制度上确立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以便防止热核战争。

这种乍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而且冠冕堂皇的言論，是以那种对目前国际形势和帝国主义的本性作出的完全錯誤的估計为依据的最恶劣的机会主义理論，也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修正主义理論。

第一，这种“向两翼分化的論調”，不外乎是考茨基之流的为帝国主义辯护的論調。这种論調是說，在同一个壟断資本主义的經濟基础上，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执行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可能执行非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

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和巩固、殖民主义奴隶制度的趋向崩潰、資本主义世界階級斗争的加剧联系起来的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和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尖銳化，的确已經深刻地反映到帝国主义上层建筑的政治上，在帝国主义統治階級中間，也产生了种种糾紛和矛盾，造成了严重而且复杂的意見分歧。看不到这种矛盾和利害冲突，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者完全塗上同一种顏色，将是一个很大的錯誤。利用他們內部的裂痕，对于和平民主力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列宁教导說：

“为了推翻国际資產階級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間通常进行的最頑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費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絕随机应变，拒絕利用敌人之間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暫时的矛盾），拒絕設法跟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暫时的、不穩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51—52頁〔中文本頁次，下同。——譯者〕）

但是，如果过高估計敌人之間的意見分歧和对立，以至于把这

种意見分歧和对立看成是冷战政策与和平共处政策的根本对立，那么就会鑄成这样一个大得无可比拟的錯誤：把“敌人之間的利害冲突”和敌我之間的不可超越的对立等量齐观，把敌人的内部矛盾和根本性质的阶级矛盾等量齐观。这是因为：所謂帝国主义者之間的意見分歧，从根本上說，始終是在适应帝国主义这个同一經濟基础的範圍內，在敌視社会主义，压迫、剝削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附屬国人民的阶级本质的範圍內，是在敌人之間产生的局部性质的意見分歧和利害冲突；这些意見分歧只是一些关于战略和策略、方向和方法的分歧，例如，哪一方面的政策能够最順利地推行战争和侵略、压迫和倒行逆施这种帝国主义政策，推行这种政策能够給哪一方面的壟断資本集团带来最大的利益，等等。事实上，战后美帝国主义内部在外交政策和軍事政策上曾經发生过这样一些严重的意見分歧：一九四八年关于对华政策的爭論；一九五一年关于扩大侵略战争的“麦克阿瑟爭論”；一九五四年圍繞在印度支那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問題的对立；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間，“五角大楼”内部在采取“大規模报复战略”或者采取“灵活反应战略”的問題上的爭論；一九六〇年圍繞金門、馬祖問題的“肯尼迪、尼克松爭論”；最近在批准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时发生的爭論，等等。無論哪一个爭論，都不是圍繞战争政策与和平政策这种根本性质的对立的意見分歧，而只是圍繞怎样才能最有效地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和鎮压民族解放斗争，怎样才能在最短期間在冷战中获胜以称霸世界等等这样一些帝国主义的这一政策和帝国主义的另一政策之間的非根本性质的局部的对立。尽管这种局部的对立加剧了圍繞这些对立的斗争，并且經常引起像肯尼迪遇刺丧命那样的丑恶的殊死斗争，但是，如果以此为理由，把这种局部的对立看成是同和平和民主政策与战争和侵略政策的根本对立有关的对立，那就会归结为这样

的主張：在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上，帝國主義政策和非帝國主義政策都能夠成立；壟斷資本主義和非帝國主義政策可以並存。

這種主張正是“把政治上的壟斷制和經濟上的壟斷制分開”的主張（《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 105 頁），也是考茨基的帝國主義論的翻版。考茨基認為，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而是財政資本所“慣用”的一種政策。列寧揭露這種看法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本質說：

“關鍵在於考茨基把帝國主義的政策同它的經濟割裂開了，把‘兼併’解釋為財政資本所‘慣用’的政策，而拿另一個似乎可能的、也是以財政資本為立足點的資產階級政策和它對立起來。照這樣說來，經濟上的壟斷是可以同政治上非壟斷的、非強力的、非掠奪的行動方式並存的。照這樣說來，世界領土的分割恰巧在財政資本時代進行完畢而成了各個資本主義強國現在互相競爭的特殊形式的基础，這樣一種情況也是可以同非帝國主義的政策並存的。這樣一來，就不是暴露資本主義現代階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飾、緩和這些矛盾；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262 頁）

但是，現代修正主義還超過了考茨基。因為，“隱蔽的機會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 81 頁）考茨基，曾經勸“金融資本家放棄帝國主義”（《第二國際的破產》，《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 206 頁），並且說壟斷資本能夠採取非帝國主義政策；而現代修正主義卻向人民宣揚說，美帝國主義者已經在採取非帝國主義政策。因為，考茨基創造了所謂帝國主義國家可以彼此放棄軍備、就持久和平達成協議這樣一種“超帝國主義論”，而現代修正主義提出了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可以彼此廢除

軍备、就持久和平达成協議这样一种應該叫做“超超帝国主义論”的論調。

不言而喻，我們承认，有可能通过以全世界范围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群众斗争为基础的“談判”，来迫使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反动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后退，也有可能进而迫使帝国主义签订一定的协定，譬如，签订包括禁止核武器在内的普遍裁军协定等等；并且承认，在打倒和消灭帝国主义以前，也有可能通过这些斗争，使防止世界战争的事业获得成功。事实上，一九五三年签订的朝鮮停战协定、一九五四年签订的印度支那协定、一九五五年奥地利实现中立化等等，都是国内外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反动政策、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以及以这些斗争为基础所取得的一定的协定和成就的实际事例。完全排除这些可能性、完全否定帝国主义作出让步的可能性的做法，意味着反而会陷入像“左傾”幼稚病那样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可是，承认帝国主义受到人民的压力而作出的一定的让步，同那种认为帝国主义已經在本质上改而奉行和平政策，或者已經从根本上、从本质上下定决心要推行同社会主义体系和平共处的政策的看法，完全是两回事。必須指出，只要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那么同在国内外进行剝削、“政治上的全面反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04頁）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政权，絕对不可能在本质上采取非帝国主义的和平政策，而且也絕对不可能完全廢除軍备，同社会主义永远和平共处。

第二，这种“向两翼分化的論調”，不外乎是被核讹詐吓破了胆、而想要迴避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机会主义为帝国主义辯护的論調。持有这种論調的人认为，分化的标准是在目前想不想打全面核战争，只要帝国主义不想打全面核战争，那么它在本质上就

是願意推行和平共處政策的。

有人說：帝國主義里面的“反動派”企圖發動核戰爭；帝國主義里面的“明智派”希望避免核戰爭；因此，和平民主力量的任務在於，聯合後者，孤立前者，以防止核戰爭。在這種論調的深處隱藏着的，首先是這樣一種想法：在核武器出現以後，在帝國主義者中間產生了希望和平的“明智派”，已經有可能通過同這個“明智派”進行談判的辦法，實現兩個體系的共處。這也就是一種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論調：放棄馬克思主義分析帝國主義的一切觀點，把一切都寄託在“明智派”帝國主義者的“善意”上。貫穿在這種論調中的第二個更根本的思想是這樣一種想法：既然全面核戰爭是最大的罪惡和最大的悲劇，那麼防止全面熱核戰爭就是人類的首要任務，沒有達到發動全面核戰爭程度的所有的帝國主義政策和同帝國主義政策進行的鬥爭，就只有次要的意義了。換句話說，也就是這樣一種想法：在熱核戰爭“毀滅人類”的危險面前，無論帝國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無論獨立或者民主，無論民族鬥爭或者階級鬥爭，都將失去它的意義。上述這種想法正是完全屈服於帝國主義的核訛詐的想法。但是，目前利用“毀滅人類”的威脅來分割反帝力量、硬要別人向帝國主義讓步和屈服的核訛詐政策，正是美帝國主義的世界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哪怕是向它的核訛詐屈服一步，也都會像火上澆油那樣地助長美帝國主義推行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氣焰。

列寧對受到“戰爭的可怕的印象”的“壓迫”而製造出來的帝國主義經濟主義的謬論曾經說：

“‘帝國主義經濟主義’對民主採取的鄙視態度，就是戰爭壓制或壓抑人的思想的表現形式之一。皮·基也夫斯基沒有覺察到，貫穿在他的全部議論中的，正是戰爭所造成的這種壓抑、驚恐和

不加分析。既然擺在我們面前的是這樣一場殘忍的大屠殺，那還談什麼保衛祖國！既然到處都是粗暴的鎮壓，那還談什麼民族權利！”（《答皮·基也夫斯基—尤·皮達可夫》，《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1頁）

現代修正主義在這方面也超過了過去的帝國主義經濟主義。這是因為，過去的帝國主義經濟主義者，害怕現實的帝國主義戰爭，放棄爭取民主的鬥爭，“從承認帝國主義存在‘墮落’到替帝國主義辯護”（《論正在產生的“帝國主義經濟主義”傾向》，《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4頁），而現代修正主義者害怕帝國主義的核訛詐，放棄了一切鬥爭，由投降帝國主義發展到美化帝國主義。

如上所述，“向兩翼分化的論調”是說，認識到熱核武器的空前巨大的破壞力量的帝國主義“明智派”，不僅想要避免熱核戰爭，而且正在開始認真地追求兩個體系的和平共處。這是一種令人震驚的美化帝國主義的意圖和政策的、近乎蠱惑宣傳的論調。壟斷核武器的夢想已經破滅的美帝國主義，面對全世界高漲起來的反帝鬥爭和社會主義國家防禦性軍事力量的威力，已經不得不考慮這樣的危險：如果發動全面戰爭，那麼美帝國主義本身也可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縱然如此，這絲毫也不等於說，美帝國主義已經放棄了它的侵略性的統治世界計劃和戰爭政策。這只是意味著，美帝國主義正在瘋狂地擴充核力量，拼命地追求打贏全面核戰爭的保障，同時在目前集中力量推行着危險性比較小、不致把美國本身的家生存作為賭注的其他方式的戰爭和侵略的政策。因此，根據當前想不想打全面核戰爭的情況把帝國主義劃分成好戰派與和平共處派的做法，不僅完全忽視了事實，而且只能陷於這樣一種反革命的立場：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的整個學說，把有沒有“核自殺”的決心當做帝國主義的新的決定性的標志，忽視（美帝

国主义)目前以“遏制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政策的危險性和它的“两手政策”的本质，实际上向全世界人民宣揚放棄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最后，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論調”借口帝国主义势力内部发生分化，忽視了肯尼迪等美国政府领导人是美帝国主义的道地地的政治代表这个事实，因此，这种論調实际上是美化美帝国主义及其政府的最坏的机会主义。

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战后的美帝国主义作为世界反动派的主要堡垒，結成帝国主义的軍事联盟，同社会主义陣营为敌，鎮压民族解放运动、工人运动、和平运动、一切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侵犯各个盟国的主权，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变成它的附屬国，剝削各国人民，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对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不同的意見。正如“超党派外交”这个名称所体现的那样，美国壟断資本集团对于美帝国主义的这种世界政策的基本內容一直是一致的。而且，战后历届美国政府，无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都忠实地执行了美国壟断資本集团的共同的称霸世界計劃，代表了美国壟断資本集团的利益。对于这一点，也完全没有爭辯的余地。美国总统、国务卿、各部部长、官僚、軍部、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大政党，都是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代理人，也就是美国金融資本家的政治代理人。美国的大壟断資產階級专政，远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加道地而且露骨。

“没有一个国家的資本权力和一小撮百万富翁对全社会的統治表现得像美国那样橫蛮，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賄賂風行”。（《論国家》，《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442頁）

让我们看看現代修正主义者备加頌揚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